

導論

一、研究動機

(一) 選擇衛生為主題的原因

清末對外戰爭的連連失利，以及中國人民普遍吸食鴉片的現象，讓中國人被冠上「東亞病夫」的惡名。隨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行，以及嚴復、梁啟超等人提倡「適者生存」、「新民」等概念，認為培養健康、強壯的國民是國家走向現代化進而防止遭到列強侵略的方法。這些觀念讓有志之士逐漸認識到「種戰」的重要。即國家要富強，必須有強健的人民，如此才能進行種族和種族的對抗，進而防止滅種的危機¹。而達到強民強種的方式之一就是注重衛生、改善生活條件。這一特殊的背景，使得衛生制度不但和國民的生命密不可分，亦和國家生存的政治問題息息相關。

此外，從清末以來，西方人對中國城市的形容詞不外乎「擁擠 骯髒」。特別是到了近代，中國城市因人口擁擠，加上傳統街道狹窄、市民不注重衛生的關係，更造成城市衛生日漸惡化的現象。這些現象讓居住在中國的西方人，相當重視租界衛生條件的改善，例如當時上海、天津的洋人，都曾積極改善租界區的衛生狀況²。經由外人在租界所實行的衛生措施，中國人慢慢意識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因為一座乾淨的城市除了能夠成為一個較少傳染病以及較適合人們居住的地方外，衛生的城市亦能夠讓外人對該座城市有較好的印象，進而改變其對中國的觀感。

衛生問題除了與國家生存、形象的政治問題相關，中國官方採取現代衛生措施，也是要顯示政府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國家，進而避免外人藉口干涉中國的衛生事務。另外，對於民眾而言，現代的衛生措施是一種新奇的

¹ 馮客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 90-114。

² 從當時每十年一次的海關報告中可以發現租界衛生是外人相當重視的課題。見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5）關於天津見 Ruth Rogaski, “From Protecting Life to Defending the Nation: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 1859-1953,”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6).

事務。政府在實行這些措施時，必然會遭遇到民眾的阻礙與不滿而如何去要求、規範民眾遵守衛生規定，進而塑造民眾成為現代文明的公民也是政府努力希望完成目標。

公共衛生是一座現代現代化城市所不可或缺的行政措施。「在十九世紀時期萌芽的城市其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就是環境的污染。」³雖然中國城市的現代化較西方晚了一步，但是城市衛生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城市亦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儘管一座城市現代化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只是公共衛生一項，且城市的公共衛生措施雖主要是由衛生局負責，例如乾淨的飲用水、醫院的管理、處理糞溺、垃圾等措施。然而，市政府的其他機構，如公安局、工務局、教育局等，亦和城市衛生息息相關。例如公安局的責任之一是取締違反衛生規定的市民。教育局則協助衛生局進行宣傳與教導市民如何維護居家環境以及保持個人的衛生。因此從公共衛生著眼，亦能旁及其他市政執行的概況。

衛生措施其實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或許是因為衛生對生活在現代化中的我們而言，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所以過去對此問題的注意並不多，因此，研究者想透過對衛生問題的研究，以瞭解現今的衛生措施是如何而來，其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哪些改變。

（二）、選擇廣州的原因

早在民國 7 年時，桂系軍閥就在廣州成立了「廣州市市政公所」，以作為廣州城市的管理組織，並且著手進行城市現代化的建設，如拆城築路、建公園、市場等。其後在民國 10 年，重新回到廣州的國民黨人，雖然志在以廣州為革命基地，進而完成統一中國的目標，但是在此同時，國民黨也在廣州設置了第一個根據西方城市管理組織的機構---廣州市市政廳。

³ Barrie M. Ratcliffe, "Cities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Elites and the Sewage Problem in Paris from the Mid-Eighteenth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Planning Perspectives*, no. 5(1990), p. 189.

當時擔任市長的孫科，根據西方的市政制度，制訂 廣州市暫行條例五十七條，市政廳下設工務、教育、衛生、公安、財政、公用六局。暫行條例 後來也成為國民政府在北伐之後制訂全國市政制度的藍本⁴。重要的是，根據時人的觀察，當時廣州市政廳所發佈的文告規章中，「以屬於衛生者為最多。」⁵而廣州市的市政建設後來在國民政府北伐時期，更成為中國其他城市仿效的對象，當時的上海市長黃郛更說：「廣州市是中國城市學習的模範。」⁶不論這是否為恭維之詞，至少反映出國民黨將廣州的市政經驗帶到中國其他的都市中。因此，探討廣州城市的現代化過程，有助於我們瞭解北伐之後中國其他城市現代化的演進過程。

廣州市西南方的沙面雖是英法兩國的租界，然其對廣州市政的影響力並不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外國租界。一來因為該地面積較小，且是個沙洲，與廣州有一水之隔，面積只有 330 畝，先天上就無法作進一步的擴充。不像上海的公共租界從原先 2,000 畝左右擴大到最後的 4 萬 8 千多畝；天津則從 1,000 多畝擴大到 2 萬多畝；再者，香港、上海在貿易上取代了廣州的位置，造成許多外人紛紛從廣州移居到這些新興的口岸城市⁷。這些現象讓民初的政府對廣州的治理有更大的自主性，這是廣州和其他有租界的中國城市所不同的地方之一⁸。在缺乏外國勢力主導或影響市政的情形下，國人如何以一己之力來實現衛生保種的藍圖？廣州正好是絕佳的觀察焦點，這也是本文選擇以廣州做為研究個案的重要理由。

⁴ 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台北：三民出版社，1969)，頁 118；Christian Henriot, trans. Noel Castelino, *Shanghai, 1927-1937: Municipal Power, 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5-26.

⁵ 黃炎培，《一歲之廣州市》(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頁 60。

⁶ Frederic Jr.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46.

⁷ 張仲禮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238；樂正，近代上海的崛起與廣州的失落，《二十一世紀》第 24 期(香港，1994 年 8 月)，頁 29-38。

⁸ 時人認為「廣州市的現代公共建設是所有中國的城市中唯一完全由中國人自己建設和掌控的。」見 Milton Chun Lee, "Public Construction in Canton," *The Far Eastern Review*, vol. 26, no. 5(May, 1930), p. 217.

二、研究回顧

過去學者對於廣州的研究，可大略概括為兩個方向，一種是從對抗帝國主義，或是從國民革命的角度出發，例如辛亥革命、沙基慘案、省港大罷工等⁹，以政治史的角度為研究焦點。另外一種研究廣州的視角，主要以經濟史為主，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廣州對外貿易，一直是研究者注意的課題¹⁰。

近來中國城市史研究日漸受到重視，除了上海這一傳統熱點之外，天津、濟南、重慶、武漢等城市，也都有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出現。而對於廣州市的研究，主要還是以通史類為主。早期有徐俊鳴等人著的《廣州史話》，或許是因為年代的關係，所以該書對於近代廣州的描述，主要集中於共產黨在廣州的政活動¹¹。近來有楊萬秀、鍾卓安編的《廣州簡史》¹²，但在論述近代廣州的部分時，主要還是以政治運動為焦點。陳代光的《廣州城市發展史》，討論廣州從先秦到現代的演變，雖然有提及民國時期廣州市的市政發展，但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和照明建設上，對於市政衛生並未加以著墨¹³。賴澤涵研究孫科主掌廣州時期的市政建設，並評論其得失¹⁴，但因篇幅的關係，該文主要還是通論的性質。最新的研究是楊穎宇(Hans Yeung Wing Yu)關於廣州從19世紀一直到1925年，共125年的時段裡，廣州城市所經歷的發展與變化。該研究也探討廣州城在此一時段中，民間組織、紳商以及官方三個階層之間的互動與衝突。雖然書中提到市政廳的

⁹ 較早的研究有 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最近的著作有 Michael Tsin,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 1900-192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⁰ 最近的著作有張曉寧，《天子南庫：清前期廣州制度下的中西貿易》(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

¹¹ 徐俊鳴、郭培忠、徐曉梅，《廣州史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¹² 楊萬秀、鍾卓安主編，《廣州簡史》(廣州：廣州人民，1996)，頁388-390。

¹³ 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廣州：暨南大學，1996)，頁129-142。

¹⁴ 賴澤涵，孫科與廣州市的近代化，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七輯(台北：聯經出版社，1985)，頁83-102。

設置，但是作者主要集中在市政廳的組織及人事問題上的衝突，對於當時的市政建設，也是以市政廳下各局處所實行之措施為主，並未單一針對衛生問題。不過作者在書中論述廣州自來水廠的興建以及拆城築路的過程，對於本研究有著相互補充的作用¹⁵。

關於近代中國城市衛生的研究，有程愷禮(Kerrie L. MacPherson)對近代上海城市衛生的研究，該書主要從城市自來水廠的建設以及西式醫院的設置為出發點，探討租界區的外國人對於上海衛生環境的改善¹⁶。羅芙芸(Ruth Rogaski)則研究天津市在八國聯軍之後，西方帝國主義將公共衛生帶入該城市的過程，以及近代自來水廠的設立和城市糞溺收集的方式與管理，對天津傳統清潔組織的衝擊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作者也討論國民政府北伐後，在天津所進行的市政衛生管理措施¹⁷。不過從兩位學者的著作中可以發現，外人(特別是租界區)對該座城市衛生的影響，佔有相當大的份量。和天津、上海不同，廣州與沙面租界的互動關係，則不像上述兩個城市那樣頻繁。李達嘉教授的研究，亦強調上海租界所實行的衛生措施，包括街道清潔、自來水廠的設置、醫療防疫等，對於華界中國人的影響，以及這些措施在實行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問題¹⁸。另外，班乃迪克(Carol Benedict)討論十九世紀末廣東地區鼠疫流行的情形，當時西式的隔離措施和傳統民間拜神除疫之間的衝突，以及英國政府在香港強制實行隔離措

¹⁵ Hans Yeung Wing Yu, "Guangzhou, 1800-1925: The Urban Evolution of A Chinese Provincial Capital," Ph.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1999).

¹⁶ Kerrie L. MacPherson,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¹⁷ Ruth Rogaski, "From Protecting Life to Defending the Nation: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 1859-1953,"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in Tianjin," In Joseph W. Esherick,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p. 30-46. 羅芙芸著；作舟譯，衛生與城市現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城市史研究》第15-16輯(天津，1998年9月)，頁150-179。

¹⁸ 李達嘉，公共衛生與城市變革：清末上海人生活文化的一個觀察，中國史學會編，《第一回中國史學國際會議研究報告集：中國の歴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東京都立大學出版會，2002)，頁71-108。

施的過程¹⁹。此研究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的認識中國傳統民間在面對傳染病流行時的因應措施。整體而言，對於近代中國城市衛生的研究還是寥寥可數。

三、公共衛生的定義與問題意識

因為當時的衛生管理措施，主要是由官方從上向下的施行，所以我們對於公共衛生的定義主要是依照官方的解釋。根據當時一篇刊載在《廣州市市政公報》的文章，衛生「即防護人體固有康健之謂。」衛生管理主要有四方面，在防疫上，必須對於食水、食品、藥品、茶館、酒樓、市場、屠場等加以檢查和取締。對於公私立醫院、瘋人院、傳染病院等機構，必須進行監督管理。在潔淨上，如對於街道之清掃、公廁及公共娛樂場所之清潔，渠道之疏浚等。在統計上，如醫師、藥房、戶口、傳染病人數之統計等。在教育上，如舉辦演講、編輯衛生圖書、陳列標本展覽等²⁰。

從這一分類中可以推測這一篇文章應該是衛生局的人員所作，因為這四項管理項目，正和衛生局下所設的四個分支單位相一致。由於公共衛生的範圍極廣，以及相關材料的侷限，因此我們的研究除了探討衛生局所注意的衛生課題外，更希望以衛生為主軸，討論市政府的衛生措施和城市的現代化之間的關係，希望藉此瞭解衛生在廣州現代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衛生除了關係到城市的現代化發展外，衛生問題如何和國家生存形象結合？官方如何透過政治力量規範市民的衛生習慣以及動員市民清掃環境？衛生管理對人民的日常生活及官方和社會的關係帶來了哪些改變？總之，我們的研究不只是一要強調衛生在廣州城市發展上的重要性，也在於彌補過去學界過於注意上層政治事件，忽略廣州在政治動盪下，更豐富多彩的市政發展與影響的不足。

¹⁹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2-180.

²⁰ 衛生行政與檢查，《廣州市市政公報》第 71 號（廣州，1923 年 4 月 9 日），頁 3。

四、各章結構

在時間斷限上，選擇 1901 年為研究的起點是因為清廷在此時開始實行新政，並設立警察機構，而警察機構負責的項目中包括了簡單的衛生管理，如不可隨便吐痰、大小便等。雖然中國的警察制度源於日本，警察管理的項目也是依照日本的制度而制訂，清廷是否注意衛生的管理還有待釐清，但是警察制度的建立，顯示中國官方首次經由警察涉足到衛生的管理上。由於此時期官方對公共衛生的參與，因此選擇以此為開始。由於本文主要論述廣州建市後，即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間，新式衛生組織對廣州市容、環境衛生的影響，以及市民對此的反應。雖然日軍在 1938 年 10 月佔領廣州，但因為在論述上稍有延伸，所以以 30 年代為斷限。

在章節上，除了導論和結論外，總共分為四章。在第一章中，我們除了論述廣州的城區發展和城市空間的安排，以便對廣州城的歷史有一初步的認識外。透過傳統廣州城的排水設施、醫療以及民間組織等，我們也要強調傳統中國城市，並不是如過去所認為，是缺乏、甚至完全沒有衛生設施的觀點。第二章中，我們主要探討在從新政到市衛生局設置前，廣州當局在城市衛生的管理與相關衛生設施的發展。包括警察和其它相關政府機構所制訂的規定，以及自來水廠和拆城築路。所有這些由官方主導的措施，對廣州的衛生和民眾生活帶來所帶來的影響。

接下來兩章，主要討論衛生局成立後，衛生局對於舊有的城市衛生設備、組織進行改良和擴充，以及衛生局如何透過教育、強制、取締等方式，向民眾灌輸相關的衛生知識，和規範、改變民眾的不衛生行為。在第三章中，我們除了探討市政廳及衛生局的組織架構及權限外，也涉及廣州當局對於衛生設備、組織的設置及改善，例如溝渠的改良、醫院的管理等。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讓廣州能夠在視覺和嗅覺上，不會產生讓人不舒服的感受，以及改善外人對中國城市不衛生的印象。在第四章中我們從規範和動員的角度切入，探討衛生局如何透過衛生教育、衛生運動、取締等方式，讓民眾參與城市的衛生改良，以及規範民眾的不衛生行為，和要求民眾遵守衛生規定的過程。



圖 1-1 廣 州 市 區 圖
根據 Michael Tsin, "Canton Remapped," p. 20. 修改